

撒哈拉以南非洲 民族国家统一构建进程

刘 鸿 武

【内容提要】 民族国家统一构建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独立后面临的时代任务,它既是这些国家实现现代经济发展的前提,更集中反映着这些国家当代历史进程的特殊性质及不可回避的曲折与艰辛。深入理解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质及核心内容,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今日非洲现实及未来的可能走向。

【关键词】 撒哈拉以南非洲 民族国家 统一构建

【作者简介】 刘鸿武,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近期著有《从部族社会到民族国家——尼日利亚国家发展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人文科学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等。通信地址: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邮编:650091。

一

民族国家统一构建(Nation-building & State-building),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当代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的主题。它包含着这样一种历史性的发展内容,即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在完成了“非殖民地化”而建成新兴国家后,如何通过进一步的国家政治一体化演进与各民族文化一体化融合,使自己得以“作为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而生存下来,并在这样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基础上,去追求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在非洲大陆,这一民族国家统一构建进程,在内容上又可分为互为动力和互为因果两个方面。¹

其一,“从政治上或制度上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的地位的获得,即每一个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在国家主权方面的集中化过程以及相应的政治现代性的获得——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力从地方集中到中央,从传统的部族首领、宗教首领、地方首领集

中到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有足够权威与合法性,从而得到全国民众共识拥戴的现代中央政府手中。通过这一“政治主权集中化”发展进程,新独立国家有能力去追求国家共同的发展目标,使国家的政策、法令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实施,也就是说,使“国家”或“中央政府”获得为全国公民所认同与遵奉的政治权威,获得一种有效的统一行动能力。这样,使所谓的“国家”或“国土”或“中央政府”等概念,在国内全体民众的心目中,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或术语,而且是每个国民都必须接受并与自己的生存利益息息相关的政治实体,更是每个国民自己的政治归属和命运所在。虽然在这个主权国家的范围内,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政府的实际掌权者,其所来自的地区、所属的宗教与民族关系,会在不同的政治集团之间更替,围绕着中央政府的权力分享也会引发种种争斗,但是,在该国疆域内生活的每个公民,都必须接受

¹ 刘鸿武:《对 20 世纪非洲现代化进程的两点认识》,载《西亚非洲》,1998 年第 1 期。

这个国家是“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存在的客观事实。

其二,“从文化上或情感上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的地位的获得,即每一个新获得独立的国家,在文化上的整合性变迁过程——将整个国家的所有民众从文化上、情感上、观念上联系和沟通起来,实现国民文化的同质一体化融合。与上面所说的国家政治主权集中化进程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有所不同,这里所说的从文化上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的地位的获得,更多地是从民族一体化(national integration)演进的角度,从国民文化同质一体化(national cultural homogeneity)变迁的角度,来理解民族国家的统一构建问题的。在当代非洲,这个层面上所谓的“民族国家统一构建”,并不一定表现为近代欧洲曾经历过的那种建立“单一民族国家”,即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的模式,也并不一定必须要非洲各国内原有的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民族,被同化成一个单一的民族,并为此强制实行国内的民族同化政策,消灭这些众多民族在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的多样性,而应该是在认可并尊重国内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继续存在的同时,去共同追求在国家疆界内的所有民族之间,建立和发展一种共有的、新的国民文化纽带或体系,一种对新独立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在全体国民间产生一种新的、有凝聚力的国家观念、国家情感和国民意识。

一种富于凝聚力与认同感的国民文化体系的形成,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生存、稳定和发展而言,都具有根本意义。就当代非洲大陆来说,这一民族文化一体化进程的目标,是要随着国内各族在文化上相互交往的扩大,使原来差异极大且相互封闭排斥的各族,有越来越多的共同文化属性与国民身份认同感,从而开始由四分五裂的传统部族社会,走向一个有机统一与紧密联系的现代民族国家。也就是说,国内各族在原有差异与多样性继续存在的同时,通过“存异求同”的努力,建立起一种超越原有各种文化、宗教、语言和传统习俗的新的国家意识、国民情感、国民观念、国民文化体系。在这一新的国民文化体系的联系下,非洲国家内的各个民族被聚合、融汇、塑造成具有某种时代特征的现代民族,即以现代国家政治框架、政治版图为基础的民族。这种所谓的“民族”,也

可以称为“国族”,即以今日国际社会认可的国家为基础的“国家民族”(state-nation)。¹

二

应该说,当代非洲国家的这一政治主权集中化过程和国民文化同质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在当代众多亚非发展中国家都是普遍存在的,只不过由于各国原有的政治发展背景、文化传统与历史特征的巨大差异,这一进程在各国所呈现出的具体模式与演进特征又有很大不同。

在那些一体化程度较高、国内民族间的联系与渗透早已存在的国家中,民族关系结构虽然复杂,但这些众多民族在历史上已经有过在同一个政治实体(诸如古代王国、帝国、统一的中央集团体制等)统治下共同生活的政治经历,从而逐渐形成了某种形态的所谓“多元而又一体”的民族关系结构。这类国家主要集中在东亚、中东及南亚某些地区,诸如中国、越南、泰国、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埃及等。这些国家的民族国家统一构建进程一般来说较有历史基础,其发展进程也较快,一体化程度也较高。

所谓“现代民族国家”,可以是单一民族国家,也可以是多民族国家。从全球比较的角度上看,真正表现为单一民族形态的国家,即民族与国家同构的国家,主要集中在西欧。在西欧,现代国家的产生是其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与民族等各方面一体化发展所导致的结果。比如近代早期形成的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等中央集权国家,大体上是在中世纪社会后期,在各自社会内部经济联系逐渐加强、统一王权兴起等力量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同质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基本上是单一民族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产生,是其民族一体化发展的结果,是其社会经济整合与联系发展的产物,因此这些国家创立时已大体上具备了使自己生存巩固下来的经济、文化、民族基础。^④在这些国家中,民族与国家具有同构性与

¹ I. Wallerste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West Africa”, in *African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Edited by Gregory Maddox, New York, 1993, p. 23.

^④ 刘鸿武:《论近代西欧率先兴起的原因》,载《思想战线》,1992年第6期。

兼容性。

就多民族国家而言,这些众多民族要聚合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它们相互间必须或者存在某种共同的文化纽带、情感认同,或者有共同的政治生活经历,或者有某种内在的经济联系并形成某种共享的利益,因为这些都可以构成一个现代多民族国家存在的基础。比如,上述提到的中国、越南、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埃及等国,情况就与西欧的单一民族国家有所不同。这些东方国家大多数是多民族国家,国家与民族并不完全等同。这些国家内的各个民族,已有在同一个古代国家机体或在同一个王权统治下长期共处生存的历史经历与交往过程了,相互间已形成或紧或松、或强或弱的经济上、文化上、社会生活上的联系与依存关系,并且因此在各民族间逐渐形成了某种共同的国家观念意识与情感,一种对某个中央集权的统一政治实体(国家、政府、首都等)的认同。这种漫长历史上的共同经历与交往,使这些东方国家在民族文化关系结构上不同程度地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不同于近代西方单一民族国家的结构,即一种在民族关系、文化结构方面“整体性发展与多样性发展两种趋势交织并存却又互动”¹的特殊格局。

这些古老的亚洲东方国家在近代也遭受过沦为西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命运。但是,这些国家在前殖民地时代便已形成的那种较为成熟规范的古代国家历史文化与政治实体,使“非殖民地化”的结果在它们身上大多表现为国家主权和独立地位的“恢复”,一种失而复得的“再生”,也可以说是古老国家的“重建”或“复国”。虽然重建起来的新国家与前殖民地时代的国家相比,在疆域之大小、民族之构成、人口之多寡以及政治制度与社会经济形态等方面,都有了重大甚至根本的改变,但这些国家在历史上积淀下来的那份共同的文化遗产与古代国家的精神纽带,使它们重获新生后,在维护国家统一、保持国家稳定方面有一个可资依托、开发和利用的基础。对这些国家来说,国家的观念、权威和利益并不完全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或虚幻的地理空间的人为组合,而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文化实体。应该说,中国、印度、埃及、伊朗、伊拉克、土耳其、越南、朝鲜等国大体上都属于这种类型的国家。

三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创建、形成、演进的动因与模式,既与近代西方国家不同,亦与上述东方古国不一样。

一方面,当代非洲国家产生的模式不同于近代西方国家那样是经过民族、文化、社会经济的一体化发展而导致现代国家的产生。非洲模式基本上是先宣布组成国家、建立政府,然后依靠政府人为的力量,借助国家和政府机构有组织的政治权力来推进民族一体化进程,为这个新国家的生存、稳定与发展寻求必要的文化纽带、国民意识和社会经济基础。于是,政府权力与国家机构,在当代非洲被赋予了太多、太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职能,政治或政府成为独立之初非洲国家最可凭借的“发展资源”,而社会的、民族的、文化的资源却相对不足或功能很弱。

另一方面,当代非洲国家的建立也不同于许多东方古国那样是经过非殖民地化而“重建”自己往昔的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在非殖民地化之后建立的一系列国家,绝大多数不是“重建”而是“新建”,不是“恢复再生”而是“创立新生”,因为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并不曾存在过,它们并不是以历史上原有的政治共同体为基础,通过古代政治的自然发展过程扩展而成的。古代非洲大陆那些有可能扩展成现代国家的政治共同体,比如在尼日利亚这块土地上曾经有过的那些部族政治与宗教文化共同体,那些古代王国与城邦国家,如古代豪萨城邦国家、贝宁王国、约鲁巴奥约王国等,有的在西方人到来之前已经衰落,有的则在近代西方黑奴贸易的摧残下瓦解崩溃。那些经过黑奴贸易后还得以残存下来的古代部族文化共同体,也往往被西方殖民者任意分割肢解。因此,二战后非洲的独立国家,基本上都是在西方殖民者任意肢解与分割而成的殖民地框架内建立的,它与当地原有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并无兼容性和同构性。

当代非洲国家创立的基本特点是国家的产生先于民族的形成,是先人为地构建起一个国家(实

¹ 刘鸿武:《民族文化关系结构的独特性与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发展》,载《思想战线》,1996年第2期。

际上只是一个政府框架),再来为这个国家的生存寻求必要的国民经济基础和文化纽带。比如,尼日利亚这个国家,在历史上并不曾有过,它实际上是由近代时期英国殖民者在西非几内亚湾地区先后建立的几块殖民地——拉各斯殖民地、油河与海岸殖民地、北尼日利亚殖民地、南尼日利亚殖民地、喀麦隆殖民地的一部分等拼凑而成的,而这几块殖民地的划定,又是完全基于当时英国的利益,基于当时英国与其他欧洲列强争夺、较量和妥协的结果。对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分属 200 多个民族的几千万黑人来说,尼日利亚这个国家的建立有着明显的偶然性、随意性和外加性。¹ 当这个国家于 1960 年宣布成立时,200 多个民族并没有聚合成“尼日利亚民族”这样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也缺乏对这个新国家在心理、文化和情感上的认同感。相反,这 200 多个民族相互间的矛盾与文化差异,构成了这个新国家稳定发展的严重障碍。

四

从当代亚非国家的种种经历看,国家与民族的一体化,统一的国民文化体系的形成,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与民族文化上的同质一体化变迁,对于一个国家能否进入现代经济发展进程,能否取得现代化事业的成功,都有着十分关键的影响。这是一种现代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制度资源、民族资源和文化资源,是支撑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内在力量。

然而,与欧洲和亚洲国家相比,当代非洲国家更多的是“缺乏作为统一国家而存在的一种历史经历、国民意识、国家观念,缺乏使国家持久团结和稳定存在的国内各民族共享的文化联系、精神纽带和历史遗产”^④。脆弱的国家结构和松散的文化纽带,使这些国家很容易受内外因素的影响而引发冲突动荡。因此,如何由传统部族社会发展成现代国家,如何将分割破碎的部族文化整合成富于凝聚力的国民文化,是非洲各国建立后面临的一个严峻而紧迫的历史性挑战。

正因为如此,在当代发展中国家群体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所面临的发展任务,有着比其他地区和国家更艰巨、困难和复杂的特点。人们总

会以一些表面现象来指责非洲,指责当代非洲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在发展方面无能。实际上,如果能有一种历史大尺度的眼光,能对文明与发展的本质有更深入的理解,我们就应该充分意识到这样一个客观而重要的事实,即当代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从一个极低的历史起点来启动它的现代化进程和当代社会变革的。这些非洲年轻国家,这些因民族一体化程度或国民文化同质性程度较低而时常被称为“部族”的非洲欠发达民族,不仅面临着艰巨的经济发展任务,更面临着同样艰巨而且更为复杂的制度、社会、文化和民族发展的任务。许多东西方国家在历史上已经取得的发展成就,如社会之整合与民族一体化,国家政治制度之初步形成,统一而集权的官僚机构的建立及其功能、职能的分化与专门化,相对统一的国家文化共识体系及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某种同质结构的出现与广泛交往关系的建立等,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能否进入现代经济起飞阶段,能否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都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前提与发展的基础条件。而这一切,对于新生的非洲各国来说都还相当不发达,因而都构成了这些国家在当代发展进程中绕不过、躲不开的历史发展任务,成为这些国家必须付出时间、勇气,要经历种种希望与挫折才能走过的艰难发展阶段。

意识到这一点,对于正确评价和把握当代非洲国家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走向是十分重要的。比如说,如果把 1960 年诞生的尼日利亚与大致在同一时期成立的新中国放在一起比较,从现代经济增长的指标看,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但从两国的历史背景与基础结构看,谁又能不考虑到这样一些客观而重要的事实——中国作为一个相对统一或有内在一一致性的政治文化实体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作为一个有统一中央集权和行政管理体制的国家,从秦汉开始也已走过了 2000 多年的历程。在这一漫长的统一国家实体发展进程中,中国已经形成了深厚的“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的制

¹ Claude Ak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risis and Underdevelopment of Africa*, Lagos, Nigeria, 1989, p. 52. 另请参见刘鸿武等著:《从部族社会到民族国家——尼日利亚国家发展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9 章。

^④ A. A. Nwankwo, *National Consciousness for Nigeria*, Enugu, Nigeria, 1985, p. 28.

度、文化、民族乃至心理方面的坚实基础。而尼日利亚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国家,只是从1960年(或许可以再算早一点,从1914年英国把几块在西非的殖民地合并成“尼日利亚殖民地与保护国”时算起)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在这个地区以往漫长的岁月里,只有过一些大大小小的部族社会共同体、古代王国、城邦国家或松散的部落联盟式的黑人帝国。因而可以这样说,1960年成立的尼日利亚联邦与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自存在的历史文化基础是相当不同的。

这一历史差异对现实意味着什么呢?新中国固然是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它是以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和民族共同体为基础的;而尼日利亚却颇不一样,它必须以极大的努力和坚韧,以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才能,去为这个新国家寻求生存、凝聚和团结的文化与精神基础,在这个艰难过程的最初阶段,某种持续性的动荡与曲折反复,恐怕是很难避免的。因此,中国和尼日利亚虽然同为发展中国家,但从现代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更广泛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看,各自已经具有的发展基础和历史前提可以说是相当不一样的。近20年来中国获得了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里面除了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的原因外,从一个更广义的历史背景上说,还与中国5000年文明史所积淀的全部发展成就也是分不开的。作为一个已有2000多年统一历史的国家,中国在民族一体化、统一的国家行动能力、民众对国家与中央政府的认可方面,所能释放出来的支持现代经济发展的潜在力量,是尼日利亚这样的非洲新生国家所不具备的,而这正是当代非洲国家所面临的一种特殊国情,是制约当代非洲国家现代化与经济增长进程的重要因素。¹这或许也正是当代非洲国家现代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一波三折、充满艰辛的重要原因吧。

五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极低的历史起点上,有许多非洲国家依然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成就。以尼日利亚为例,它在20世纪70年代曾因石油收入增加而使人均国民收入一度达近1000美元,这

不仅在当时的非洲,即便是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相当可观的水平了。不幸的是,这个国家在后来的岁月里,由于动荡不定的政治格局和持续不断的民族矛盾与地区冲突,经济形势逐渐恶化。90年代初,尼日利亚人均国民收入竟一度下跌到不足300美元,由“非洲经济巨人”几乎沦为“非洲经济乞丐”。^④这种情况在当代非洲大陆并不是一个特殊例子,而是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那么,我们是否因此就可以说像尼日利亚这样的非洲国家近几十年的现代发展进程是完全失败的,是完全失去的几十年呢?有些学者将尼日利亚经济“起飞—跌落”的状况称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断”^④。这种经济发展的起伏,是否真正标志着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断”呢?

情况显然要复杂得多。事实上,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作为传统农业文明形态向现代工业文明形态的过渡转型,固然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内容,但它涉及的社会变迁内容要广泛复杂得多。现代经济要获得发展,还必须以非经济领域的许多发展成就为前提条件或宏观背景。当代非洲的发展成就主要不是表现在经济增长或经济起飞方面,而是集中体现在国家和民族构建与发展方面,表现在各国所追求的新型统一国民文化体系的初步形成方面。

可以看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非洲各独立国家在实现由传统、分散的部族社会向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过渡方面,在实现由传统封闭、分割破碎的部族文化向同质一体化的现代国民文化过渡转型方面,尽管历经曲折反复,但还是取得了明显进步。事实上,在今日非洲的许多国家,一种超越传统部族情感与地区观念的“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正在形成并被认可。随着这种统一国家文化力量与观念的成长,随着这种富于凝聚力的统一国民文化环境的形成,非洲各国也就越来越有能力去克服各自国家内部的分离内乱与冲突,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也将日益得到国民的认可。尽管这一成就在非洲各国所达到的水平

¹ Paul A. Cammack, *Third World Politics*, Macmillan, London, 1988, p. 273.

^④ Toyin Falola, *The Rise and Fall of Nigeria's Second Republic, 1979-1984*, London, 1985, p. 235.

^④ Paul A. Cammack, *op. cit.*, p. 273.

和巩固的程度并不一致，特别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经济发展成就作支持，这一国家政治发展与民族发展的成就不仅受到了很大抑制，而且已经取得的发展成就也是很不稳固的。

但是，还是可以这样认为，非洲各国当代发展的主要成就，集中体现为“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的地位的获得。比如，同 20 世纪 60 年代初相比，今日尼日利亚显然已是一个具有稳定生存能力的统一国家，一个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拥有统一行动能力的国家。¹ 对于今日大多数尼日利亚人来说，无论其在宗教上属于穆斯林、基督徒或土著宗教的信奉者，无论其在种族上是豪萨人、约鲁巴人、伊格博人抑或其他民族的人，也无论其在语言上、习俗上有什么各不相同的背景、经历与传统，一种超越原有各自民族、宗教、文化、传统的新

的尼日利亚国民情感、意识和文化体系正在兴起，这一新的国民文化体系使尼日利亚人在文化上被联结和沟通起来，一个新的尼日利亚民族正在形成中。

当代非洲国家政治主权集中化过程和国民文化同质一体化进程的逐渐推进，正是 20 世纪非洲历史与现代发展进程中最重要也最有意义的成就，而这一成就将为非洲 21 世纪的发展，特别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和新的历史起点。

(责任编辑：吴传华；责任校对：徐 拓)

¹ Veronica Glickman, *Ethnic Conflict,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and Democracy in Nigeria*, Atlanta, Georgia, 1995, p. 312.

安理会有关塔利班及本·拉登的决议

1. 1999 年 10 月 15 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 1267 号决议。决议称，安理会成员国注意到美国已经以炸毁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使馆为由，对本·拉登及其同伙提出起诉，并要求塔利班在 30 天内将这些人交出受审，否则，联合国成员将拒绝对塔利班提供空中交通方便，并将冻结其在海外的资产。同年 11 月 14 日，联合国对塔利班的制裁措施因塔利班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交出本·拉登而自动生效。

2. 2000 年 12 月 19 日，联合国安理会以 13 票赞成、2 票弃权通过 1333 号决议。决议要求塔利班毫不拖延地将本·拉登送交已对他起诉的国家，并立即停止向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及组织提供庇护和训练。安理会还要求联合国成员国关闭塔利班在各国境内的所有办事处，禁止其高层领导人参加除和平谈判、履行人道主义和宗教使命外的所有国外旅行，禁止除出于人道主义目的外的所有航班进出阿富汗，并冻结塔利班在海外的所有资产。安理会说，除非塔利班全面执行联合国 1999 年通过的 1267 号决议以及其他决议，否则以上新的制裁措施将在 1 个月自动生效。新制裁措施的实施时间暂定为 1 年，届时联合国将根据塔利班执行决议的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实施这些制裁。

3. 2002 年 1 月 16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国际社会继续执行对塔利班残余势力、本·拉登及其领导的“基地”组织和他的支持者的武器禁运和出入境限制。安理会要求，所有国家在 3 个月内向安理会阿富汗制裁委员会报告决议的执行情况。

(吴传华)

The *Status Quo* and Tendency of the Two Hot Issues in the Middle East

Liu Yueqin

pp. 6– 9

There is no sign of the cease of Palestinian – Israeli violence broke out in September 2000. To the contrary, it is sliding into a mire of vicious circle: Arafat is still confined; Israeli military actions have continuously escalated and it seems hard for the two

sides to reach any agreement. The US takes a stiffer stance towards Palestine, and President Bush criticized Iran and Iraq by name, denouncing that their nature of developing destructive weapons has not changed. All these show that the anti- terror war may be expanded.

The Refugee Problems in Afghanistan

Xiao Xian

pp. 10– 13

Twenty years of continuous wars and the biggest drought in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have made Afghanistan one of the countries where refugee problems are the most serious. After the September 11 Attacks, the US – led military strikes on Taliban regime made the refugee problems even worse.

Although Taliban period has already ended in Afghanistan and its reconstructions has been put on the agenda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repatriation and the placement of millions of refugees will challenge the long suffering Afghanistan and its neighbors even the whol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Process of Nation– building & State– building in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Liu Hongwu

pp. 16– 21

After independence, the task of the day to African countries south of the Sahara was nation– building and state– building, which was not only the prerequisi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nomy, but also reflected the peculiarities and unavoidable complications and

hardships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African countries. A deep study of this issue is helpful for u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lity of today’ s Africa and its possible tendency.

The Regionalism Background of Kenya’ s Political Parties

Zhang Yongpeng & Cao Xuemei

pp. 25– 28

Regionalism in Kenya’ s political parties has profound historical roots. As a major ethnic group, Kikuyu acquired a leading position in Kenya’ s nationalist movement and progressively developed a sense of superiority, which contradicted the interests of the vast minorities. The conflicts were also mirrored in struggles among political parties. Dur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interests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ose of regional ethnic groups, regionalism has been used as a special tool by the two forces and it was also an underlying impetus to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parties, which were demonstrated, to different extent, by the splits and evolutions of Kenya African National Union and Forum of Restoration of Democracy.